



南早中文專訪閻連科：中國出版制度沒那麼糟

閻連科認為，中國的審查體制一直存在較大的彈性。作家因而擁有選擇的可能。

2013年11月4日 上午9:59



“中國的出版制度並沒有那麼糟糕。”這句話出自閻連科口中，實在讓人感到意外。

被戲稱為“被禁稿次數最多的中國作家”，在連續數部作品被點名批評後，閻連科最新一部描寫一個村落通過權力、偷竊和性交迅速發展成國際大都市的魔幻主義小說，在內地得以順利出版，讓很多人感到驚訝。出版前，連閻連科本人也沒有十足把握。他直言，“《風雅頌》之後，我寫《四書》等(作品)就已經徹底不想這個(能否出版的)問題了。”

不少人將此書得以在內地出版，視為國內審查制度轉好的一個信號。

“他們想錯了”，閻連科在2013年10月29日接受南華早報中文網專訪時說，“大環境並沒有變，書可以出版了，是因為出版界有很多有良知的人，有良知的知識分子。”

他認為，中國的審查體制一直存在較大的彈性。“審查是存在的，但今天的審查制度不再是什麼都不可以寫，而是什麼都可以寫的，作家可以選擇要做什麼樣的寫作。”

閻連科甚至認為，當下中國是最好的寫作時代。“中國作家到了一個最好的寫作時期。這不是說他的寫作生態，而是說寫作資源。而且你是可以選擇的，這個選擇不會像以前那樣，一選就把你選進監獄去。”

選擇的可能

閻連科無疑是內地作家中的一個異數。

在別人“向著光”寫作或“藉著光”寫作的時候，閻連科說他要“穿透光明，走向黑暗”。批手小說《為人民服務》，被視為是21世紀初中國大陸最具爭議性的小說之一。他隨後又撰寫了抒寫河南艾滋病的《工莊夢》，以大躍進、大饑荒為背景的《四書》，視角都放在社會的最底層。

“全部的寫作離不開河南的土地，離不開從小生長的村莊。這個村莊是你全部寫作的最大的資本。”他瀟灑地說。

2012年，展現在世面面前的是一個真實而無奈的閻連科——他的作品蜚聲國際，2005年以長篇小說《受活》分別獲得第3屆老舍文學獎優秀長篇小說獎及第2屆鼎鈞雙年文學獎魯迅文學獎。2013年入圍第五屆布克國際獎(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)終選名單，可在國內，他窘迫不已：兒子因沒入黨遭遇壁壘，抱負難酬，新著作《四書》，內容敏感，在國內連遭20家出版社拒絕；就連在北京生活、創作的園子，也因“違建”，被拆除掉。

2012年4月，閻連科在美國紐約時報報業集團旗下《國際先驅導報》上發表題為《喪家犬似的一年》的評

論文章，把2011年的生活形容為“一條沒有光的隧道”，“漫長而黑暗”。

閻連科坦言，他不止一次考慮過離開北京、離開大陸，可是舊習難易。“我離開大陸就完全無法寫作。”閻連科對南華早報中文網記者說，“這不光是一個語言問題，而是說如果你真的熱愛寫作，你不會離開那片土地。我們很多流亡作家非常了不得，很有才華，但出去以後的寫作會發生巨大的變化，我們的文化土壤和歐洲等其他地方是十分不一樣的。今天的大陸三年兩年就發生巨大的變化，你離開大陸五年，你知道的大陸的情況已經完全不是那樣了。而且今天的大陸是可以選擇（寫什麼）的，只是你有沒有能力選擇，有沒有膽量選擇。”

“我經歷了十年的自我審查”

閻連科第一本被禁的小說，是《為人民服務》。廣州《花城》首發後，中宣部和新聞出版署一改以往禁書用電話通知不留痕跡的做法，首次聯合發文至全國縣級以上單位。《為人民服務》成為開放以來 享受北京書面禁令的第一本小說，也令閻連科成為中國最受爭議、官方最不喜歡的作家。

但閻連科並不認為《為人民服務》是一部上乘的作品。“它並不具有代表性。”我在全世界範圍內賣得最好的其實是《丁莊夢》。大家都以為是《為人民服務》，但其實大家都判斷錯了。

閻連科說這本小說的出爐，“純粹是為了應付別人的約稿”。“它影響了我十年的寫作。在這十年裡，自己對自己的審查，到了十年後才醒悟過來，原來自己對自己審查了。不管《丁莊夢》在全世界多麼受歡迎，我非常知道，如果我自己不對自己審查，我能夠寫的會比今天的《丁莊夢》好得多。”

“我也非常羨慕香港這種環境。可以有言論的自由，精神的自由，乃至對一個作家說想像的自由，但是在大陸，很多作家沒有想像的自由，這不一定是因為製度，不一定是因為機制，而是自己對自己的約束。這是最可怕的。所以內地作家首先做的，是自己把自己的約束拿下來。”

新作《炸裂志》，閻連科是滿意的。

這是一本用“神實主義”手法映射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中國及人的精神的“核裂變”的小說。《炸裂志》是炸裂市的市志，炸裂本是個自然村，與新中國一道經歷土地革命打土豪、分田地，又經歷土地集體化，建立農村合作社。上個世紀七十年代，商業重新回到炸裂人的生活裡。依靠村長孔明亮和妻子朱穎所搭建的權力、偷竊和性的腳手架，村莊在極短時間內，成為超級大都市，甚至被暗示變為一個獨立國家的可能。

“每個作家都在下一步作品中尋找新的突破。對一些讀者來說，再也沒有小說比這部更直接地面對當下的中國了。而對我本人而言，這本小說的最大變化是，它是被接受的。”

“中國人的內心，已複雜到文學無法把握的程度”

閻連科說，文學是不關心政治的，而是關心人心的。可當回到人心上談論文學時，卻會發現當下中國人心靈的複雜性已到了文學無法把握的地步。

閻連科回憶年幼時故鄉村莊道路兩旁滿是參天的大樹，現在已都不存在。都被村里青壯年偷伐掉換錢。但讓他最為吃驚的是，連家族祖墳兩旁的樹木也被砍個清光。“這對一個中國人，一個河南人，一個農村人來說，是不可接受的。但居然沒有任何人覺得為了掙錢，這有什麼不合適。人心到了這個程度已經不可逆轉。價值觀已經非常認同這件事情，覺得它沒有什麼不對的。”

面對荒誕的現實，閻連科直言，文學沒有能力改變社會現實，但文學有可能修正人心的偏差。“當代中國文學的意義就是面對如此扭曲的人心，給予一點點的校正，關注和批判。你不能指望教育、不能指望政策，也不能指望某位國家領導人對人心發出聲音來。”

在閻連科眼裡，在大陸創作文學的最特殊之處正在於此：人心到了文學無法把握的地步，而文學又不能不面對人心。如何去寫，寫什麼，在他看來，這才是當代作家需要回答的問題。

他說：“任何作家都一定要去面對這改革開放三十年。你的回答不一定是正確的，但一定是最個人的，也是最真實的。”

（閻連科此行赴港，受邀於香港科技大學高等研究院2013年中國文學創作研究專題。南早中文感謝劉劍梅女

[士為採訪提供幫助。\)](#)

-

版權聲明：《南華早報中文網》所有文章版權由香港《南華早報》集團所有，未經許可，不得翻譯或轉載。

Echo Hui

</tc/author/11344/echohui>

[Copyright © 2015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ublishers Ltd. All rights reserved.](#)

Source:

<http://www.nanzao.com/tc/14c31506a470c8b/nan-zao-zhong-wen-zhuan-fang-yan-lian-ke-zhong-guo-chu-ban-zhi-du-mei-na-me-zao#>